中国第七届全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文　义

今年是清军入关350周年、郭沫若同志发表《甲申三百年祭》50周年。由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吉林师范学院历史系、吉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大学出版社、辽宁少数民族古籍出版办公室、辽宁民族出版社、辽宁民族研究所、辽宁师范大学、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鹏达企业集团等20个单位发起，由辽宁大学主办的第七届中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于1994年8月30日至9月2日在沈阳召开。来自6个国家和地区的百名专家学者汇集一堂，就清军入关350周年带给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现将讨论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清军入关与中国社会宏观运动

本次学术讨论会与以往不同之处是有较多的研究者注意到历史的宏观层面。

王充闾的论文《努尔哈赤迁都探赜》从地缘政治出发，指出努尔哈赤在38年时间内，频繁迁都，为历史所仅见，几乎每次都遇到并克服了短视和惰性所产生的阻力。联系到历史上刘邦、项羽以及稍后的李自成的建都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可见努尔哈赤确有其“高超的识见，宏伟的抱负，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1644年是中国历史的关键年代。以此为原点，学者在纵横两个方向上扫视历史的宏观运动。蔡美彪以《清史的分期》为题，阐述了清史应包括有清一代，并按其发展趋势划分阶段的观点。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在《清军入关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一文从历史的横向比较中，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当时清军比明军和农民军所占的优势，最终胜利绝非偶然。孙文良的《明清兴亡史略钩玄》一文指出，明亡预兆在明神宗亲政一段之后已现；清太宗即有灭明之谋，然终其一生无完全实现之行动；清军入关的方向路线中途有变；顺治二次登极应引起史家重视等，颇多新意。

有些论者对历史进行纵向观察。董守义的论文《350年间中国人时代观与爱国观之流变》指出面对中国向近代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的时代观和爱国观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他说，清军入关时，人们的时代观是“天崩地裂”。当时人们的爱国观内涵是光复华夏。宗旨在于恢复汉家天下，保卫华夏衣冠。200年后，中国面临列强侵略，这时人们认为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的爱国观内涵是变法自强。在爱国观中，增加了开放求新，追赶世界现代化步伐的意识。300年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认为他们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人们的爱国观内涵是净化世界。350年后，中国人认为我们正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国人的爱国观

内涵突出表现在“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在这种爱国观下，人们以开放和改革两大动力推进现代化。焦润明的论文《论满洲贵族集团入主中原对中国近代化的滞后影响》，从近代化历史进程的角度，着力阐述清军入关的负面作用。该文还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在清代二百余年的统治期间酿成的，对落后的原因，“既应从明末清初社会变动的历史背景中，也应从统治集团主体在社会选择中的文化自觉程度方面去寻找解答。”

有的论者对万里长城的功能进行了思辨，强调随着清军入关，万里长城的历史作用已经完结。冯春江的论文指出，康熙皇帝不承认长城的国防价值，认为治国之道“在德不在险”；康熙在巡视过程中了解到长城有多处损坏，他指出不必维修，以免劳民伤财。这是他总结历代封建帝王治国经验而得出的治国方针。郑川水的论文《论清军进关与明九边镇戍制的崩溃及影响》与冯文异曲同工，他认为，清兵入关，使明朝的九边镇戍制彻底崩溃，是社会的进步，开创了万里长城功能性变革的新篇章，为此，长城由军事型向旅游型和教育功能型转变。该文还指出，九边镇戍制的崩溃和清兵入关破除了明朝人为设置的导致民族矛盾与隔阂的壁障，促进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密切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他们都对康熙皇帝在 200 年前就主张把长城作为文化古迹来保存的方针给予高度评价。

在清军入关与民族关系问题上，论者趋于共识。王钟翰先生的论文《清军入关与满族的政治思想文化》指出，清军入关本身就是民族间的融合事件，满族政治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在清军入关之前再经过康、雍、乾三朝长达 150 多年逐渐完成的。在政治上，清军入关之初就大量录用清化汉人（汉军）以及采用明制，并录用曾在明朝时任职的汉官。康熙皇帝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竟能实行儒家所谓的纯王道政治，不愧为有清一代的真理学或真道学的政治思想上有突出贡献的第一人”。雍正帝治国雷厉风行，他关于东夷、西夷均属中华的论断，不啻是满族对汉族的认同，为颇具特色的历史文献。“雍正是属于杂以霸道的政治思想文化统治范畴之内的。”乾隆是“‘独尊儒术’文治武功卓有成就的政治思想上一个了不起的封建帝王”。李春光除同意以上意见外，还认为，清统治者学习汉文化的结果是：一、推动汉文化发展，二、提高满族人的文化素质，三、缩小满汉差距。支云亭的论文《从满族崛起统一中国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指出，满族贵族的民族政策虽然有其失败之处，但主要是成功的。其政策的精髓是：求同存异联合友好；不执拗，善于学习先进；化解矛盾安抚生存；崇信喇嘛教笼络蒙、藏等族，尊崇儒教控制汉族等族，促进了各民族人民的思想文化交流。这一民族政策的作用是：“弥补了自身力量的不足，统一全国，统治控制着多于本民族人口几十倍或几百倍的其他各民族，建立并维持了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久的少数民族王朝。”

二、清军入关与政治军事谋略

以清军入关为线索，研究政治军事谋略的文章相当引人注目。赵展的论文指出清军入关取胜是三方面势力角逐的结果。王思治和吕元骢的论文《甲申之变与清军入关》进一步指出，清决策者曾经有退保山海关与进取中国之争，是多尔衮决意进取。从顺治元年五月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军统一全国顺利，既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政治谋略的胜利，因为当时多尔衮标榜“有救中国之心”，把矛头引向农民军。从顺治二年六月以后，清军迅速统一全国的受阻，其关键是再颁剃发易服令。

袁闾琨的论文《清军入关谋略》则宏观概括说，在努尔哈赤时，清方已经把征明作为战略目

标了，皇太极时坚持这一目标，并从谋略上提出了具体的方针、政策，他断然改变努尔哈赤的“以力服人”的政策，对明采取“亦谈亦打”的策略，对朝鲜、蒙古实行严酷的军事征服，从而使明朝的“以夷征夷”的战略破产，皇太极是一位审时度势的战略家。多尔衮则是一位善于抓住机遇的战略家，是实施征明战略目标的执行者。他的结论是，清朝势力一方的智慧优势引导了社会历史走向。

明与后金的和谈，在双方来说，都具有权谋的用意。柳海松、徐雁来的文章以详实的史料说明，双方都缺乏诚意，因而不能不破裂，就其对双方的影响而言，则对后金更为有利。谢肇华、何溥滢的《清入关前后对朝鲜政策的变化》一文指出，清方因军事、政治形势不同，在入关前后对朝鲜的政策有很大变化，入关前，对朝鲜实行侵略——威压政策；入关后，迅速调整政策，由威压转而为和缓，使清与朝鲜的关系变得稳定和密切起来。金启琮、齐木德道尔吉的《清入关前的政治形势及其演变》一文以联蒙问题为中心，具体分析了农民军在民族问题上的失误。该文说，农民军本有蒙民联合的基础，也有与后金联合的机遇，皆因策略不及，致“使有亡明之名，而未得亡明之实”。关克笑的论文从八旗清兵、农民军、明朝兵的军事行动效果入手，说明“清以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八旗劲旅为依托最终定鼎中原，这正是历史的公允，是历史的必然。”该文力驳过去的“清兵窃取农民起义成果”之说。张上尊的论文着重从军粮给养角度谈明清战争的胜负。日本学者细谷良夫的《关于乌真超哈（八旗汉军）》的论文是对该课题为数不多的微观研究。

明与后金之间的宁远之战，早已为论者所瞩目，其时，此役之分战场在觉华岛之战，然向为人们所忽略。阎崇年的论文《论觉华岛之役》勾稽史料，详述此役原委，并分析明与后金在这次“剧烈的军事碰撞”中各自的得失。徐彻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巴夏礼应否扣留的问题》也属于斗争策略探讨之列。刘凤云的论文《一次决定历史命运的抉择》，从吴三桂降清入手，说明李自成出兵山海关，本为招抚吴三桂，却使吴三桂投降了清朝；吴三桂欲借兵清人，却反被清人利用；多尔衮原想自北边入京与农民军决战，却在山海关一举获胜。他们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却“融为一个平均数”，从而导致了最终的结局。

台湾学者刘凤翰提供了《晚清的陆军改革》的长篇论文。

三、清军入关与政争吏治

顺治帝是否出家，是清初三大疑案之一，而顺治遗诏则是疑案中的一个疑案。王戎笙的《顺治遗诏与清初权力斗争》一文根据当时的政治背景进行考辨，认为是他人伪造，并明确指出“是孝庄文皇后玩弄政治权术的又一杰作”，其作用在于“平息满族贵族内部的权力之争，成功地实现权力的平稳转移”。日本学者香坂昌纪的《清代帝权确立之一个过程》论及雍正帝时期财政改革与权力斗争的关系。

吏治与反腐倡廉问题是本次会议的热门话题。韦庆远的论文《〈明清档案〉与顺治朝吏治》独领风骚，根据台湾陆续出版的《明清档案》的详实记载，说明顺治朝虽然坚持整肃吏治，但腐败仍十分盛行。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因袭旧体制，二是由于地方官吏的素质太坏。该文又将当时官、吏、役三者的关系具体展开，说明朝廷虽然一再申严统驭吏役和惩治不法吏役的政策，但实际上，又为吏役藏身官衙并肆行奸恶提供着大量空间，给予适合其运作的土壤。卢经的《乾隆朝贪婪督抚资财一瞥》以乾隆朝为断面，述及贪婪督抚资财的状况、来源、走向以及最后被处置的情况。李国荣的《论雍正帝对官衙书吏的整饬》一文，以一个皇帝为中心，选取其吏治措施的

一个侧面进行个案研究。梁志忠的论文撮述具体史实，说明清军入关后虽然实行武力征服政策，不得民心；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从多尔衮到顺治进行的反腐倡廉、严肃军纪，因而保持了八旗劲旅的战斗力。张杰、刘中平的论文《腐败葬送江山》则从明朝各个方面的永无底止的腐败，助成了清军的胜利立言，引出深刻的反思。

四、清军入关与清代经济

清兵入关对中国社会经济起到怎么样的作用？这是一个传统课题。王兴业的论文《清初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缓慢恢复》提出了新见。他在具体分析基础上，指出了清初的经济政策既有顺乎历史潮流而行的进步性，又有逆乎历史潮流而动的落后性。至于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他认为不及明初经济恢复之快。他的结论是，清初执政者在政策上的局限与失误，使中国丢掉了快速发展生产力的时机，中国的农工商业及科学技术已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开差距。美国学者袁清的论文《清军入关女真族的经济实力》旨在说明清军入关的经济背景。张立真的《从"京旗还屯"的失败看满族社会化的必然趋势》旨在说明清兵入关后，由国家包养八旗人丁的制度渐渐使国家不堪其负，于是有持续百余年的京旗还屯之举，然而鲜有成效。其结论是，当社会转型之际，以倒退的措施处理社会问题必然失败。杨天在的《从承德一带土地的开发看清初的土地政策》具体阐述承德土地垦殖始末以及清政府的土地政策的变化。

日本学者松浦章的《清代中期的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加藤直人的《关于清代双城堡之屯垦》以及邓亦兵的《清代前期沿海运输业的兴盛》，郭蕴静的《康雍时期天津的经济》、刁书仁的《论清代东北流民的流向及其对东北的开发》，赵蕙蓉的《粮食供应是晚清京师一个严重问题》以及邢安臣、王云鹏的《清代苏鲁克养息牧场》都就一个地区一个问题进行个案研究。

五、清军入关与风俗文化

文化问题是本次会议的另一热点。韩国学者郑锡元的《清朝时代的韩中文化交流》很有特点。该文说，李朝 500 年间，号称儒教王朝，朱子之学给终有至高无上地位，其中，前 250 年与明朝有关系，后 250 年与清朝有关系。在清兵入关前后，朝鲜持"反清崇明"观念；至清政权稳定后，乃重新吸收中原文化。其文化交流的主体为"北学派"，其内容实为"清学"，该派倾向于利用厚生，积极引进中原文物。该派对于中原文化的文学和考据学的东传颇有贡献；传播途径有二：一为赴华使成员之见闻录，称为燕行录，二为对华交游；三为搜寻图书。

不少学者致力于阐述清统治者入关后积极吸收汉文化的事实。有关清军入关对文学发展、对戏剧繁荣、对宗教信仰、对宫廷建筑、对皇室卤簿仪制、对工艺美术的影响皆有专文论述。这些论者充分肯定了满族善于学习，推陈出新的能力。正如王政尧的文章《满族入关与清前朝戏剧文化》所言："满族的开放性、包容性、可融性等在推动清前期戏剧文化的发展方面表现得颇为突出，并使有清一代的戏剧文化一步步迈向了它的鼎盛时期。"关于满族的传统文化，论者注意到满族虽然有"马上民族"之称，但与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不同。林乾的文章概括说：满族文化"具有鲜明的二元文化特质"，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混合。"这两种带有排斥性的异质文化，由于特殊的地理、人文等因素的影响，却有机地统一在满族共同体内，并在相当一段时间

（下接第 92 页）

的问题上，或者说史学界有争论的问题，作者经过慎密的判断和思考，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诠释。

以上意见是我们拜读了戚其章同志的大作后引起的一些感觉、联想和思考，粗浅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主要是想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引起读者的重视和兴趣，此书值得一读。

（上接第 103 页）

相互吸纳、作用。满族文化的这种特殊性对清朝的统一，以及入关后对广袤疆域的长期而有效治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意大利学者斯达理和俄国学者庞晓梅分别就满族文化问题发表意见。

一些论文指出，入关后满族迅速汉化，这是历史的进步。邓天红则强调说，这种汉化是被改造后的新条件下的“汉化”，它也包括满族文化的突出贡献，而不能简单的以落后归并于先进为结论。

此外也有一些文章从社会学、城市学进行研讨的。隐士及秘密会社既有社会学的意义又有政治学意义，已往论述不多，此次会议何龄修、岑大利等分别进行专题阐述，颇多新见。

此次讨论会涉及到的专题人物有努尔哈赤、皇太极、崇祯帝、范文程、阿桂、刘兴祚和慈禧等。